引言

一

本書的「戰時」，主要指抗戰時期，然而如果讀者想要從這本書瞭解中國抗戰，肯定會大失所望。因為這並不是一本講述抗戰的專著。這本書真正要面對的是中國共產黨，一個在抗戰的艱難困苦中成長起來的政治力量。抗戰是背景，真正的主角是中共，當然，抗戰的背景也絕非可有可無。

從抗戰之初局處西北一隅接受改編，到抗戰結束時成為一個全國性的大黨，和當時的執政黨國民黨平起平坐，中共在八年內走過了奇跡般的發展道路。抗戰初期，蔣介石曾經提出抗戰建國的口號，然而真正實現了這一口號的不是國民黨，卻是他們的對手和夥伴：中國共產黨。

經常聽到一句老話：失敗是成功之母，套用到中共抗戰前後的歷史，似乎如此貼切，因為此前的中共剛剛經歷了一次慘痛的失敗，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此時的成功是糾正此前錯誤的結果。不過，歷史學的邏輯常常未必就是歷史本身的邏輯，政策改變很多時候只是時也、勢也，不一定就是經驗的升華，起碼不純粹是這樣。回顧這一段歷史時，毋寧說更多想到的還是另一句老話：禍福相依。

1934年，中共離開江西，經一年長途跋涉到達陝北，並在此暫時找到棲身之地。如果放遠眼光，或可發現，中共這是從一個夾縫來到了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另一個夾縫。1930年前後，由於國民黨內部的爭戰，南京政府控制力軟弱，贛南、閩西地區成為國民黨中央和地方控制之間的夾縫，中共在這裏找到了良好的發展空間，同樣的地區還有鄂豫皖、湘鄂西等等。1932年後，隨著國民政府控制力的加強，勢力範圍開始以放射狀向四外推展，中共原先尚可依以生存的夾縫在南京中央的強力面前被逐漸弭平，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據地先後失去，最終中央蘇區也難以抵擋上升中的國軍的進攻。很明顯，膨脹中的國民政府已經不太可能給中共在長江中下游地區留下生存空間。

相比東南地區，此時南京中央對西北仍然鞭長莫及，地方實力派基本各據一方。陝北作為貧瘠之地，統治力量尤為薄弱，中共在這裏意外而又勢所當然地進入了另外一個夾縫。由於中共最主要的對手還是南京中央，所以，南京力量在這裏的相對薄弱讓經過長征已經奄奄一息的中共爭得了寶貴的喘息之機。從這個角度說，中共在西北仍然是夾縫裏的生存。

大概國共雙方都不會想到的是，在國民黨中央力所難及的陝甘地區，中共完成了和張學良、楊虎城的接觸，從而繃緊了西安事變的利矢；更重要的是，身處西北這一地域，為抗戰爆發後中共挺近華北提供了良好的條件，開啟了中共在抗戰時期建立敵後根據地的大門。處身西北、華北這樣國民黨中央無法直接控制的區域，又背靠蘇聯，恰處日蘇潛在對抗的掎角前沿，這種非人力的偶合豈非天造地設。

一個新生的力量由於其弱小，不得不利用縫隙求取生存，事實上，華北地區在中日戰爭爆發前，已經成為日本侵略下中日兩國力量對壘的夾縫。

日本佔領東北後，不斷蠶食華北，壓迫國民黨中央力量出河北甚至河南，所以，和國民黨中央在南方滾桶式推進，戰前即基本完成東南、華南乃至西南地區的統一不同，華北地區國民黨中央的力量始終踟躕不前。相比陳濟棠、李宗仁及劉湘等地方實力派多米諾骨牌般的歸順態勢，應該說，華北像韓復榘、宋哲元、商震包括閻錫山這樣的地方實力派並不具有超過陳濟棠、李宗仁的實力，他們能夠與南京中央博弈，保

持相對獨立的姿態，日本人在背後起著關鍵作用。南京中央統一的大旗受到日本人抵制，在華北無法發揮威力。南京中央在華北始終無法建立有效控制，這樣的態勢，在戰爭爆發後，隨著中國軍隊的迅速退卻及日軍的迅速南進，導致華北平原出現短暫的統治真空。由於中共的積極主動和獨立進取，他們抓住了這一時機，在抗戰初期獲得了奇跡般的發展，這一發展相當程度上奠定了日後中共根據地的基礎，並對此後中國歷史的進程意外地發生了巨大的戰略性影響。由於此，本書觀察的地域也主要限定在華北地區。

歷史不能過於強調命運，強者總是能扼住命運的咽喉。如果不是毛澤東堅持開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把建立根據地作為戰爭初期的基本方針，中共也不可能抓住華北的機會，所以，機會終究還是屬於那些能夠抓住的人。中共是極具能動性的政黨，這是共產主義政黨的共性，革命從南到北，在不同時段、不同地區，不同地理、社會、人文、經濟環境下展開，循著的卻是基本相同的路徑。在中共革命中，人們通常看到的是革命改變現實，而不是革命被現實捆綁，血緣、學緣、地緣乃至社會、經濟、地理這些因素，常常被革命的能動性拋在後面。改造而不是適應世界，是共產主義革命的重要法則。

不過，能動性終究也有其限界。試想一下，如果不是1934年的失敗，導致中共不得不轉移到陝甘地區，從而在抗戰中出兵華北，抗戰初期華北形成的短暫統治真空時期如何有可能利用，這樣看，歷史的機緣又真是神奇地存在於歷史的深處。再回頭看，當南京中央鞏固自身，全力以赴對付中共時，中共好像很難有繼續在東南地區立足的機會，西走幾乎又是唯一選擇，畢竟，夾縫中生存仍然是中共此時的首選，何況西北地區還有背靠蘇聯這一戰略優勢。所以，看似偶然的一切，又隱含著趨勢性的理路。說起來，對手的機會往往來自自身的缺陷，南京中央在內憂外患形勢下控制力的薄弱，才是真正造成這一切的致命傷，而日本人又在這樣的傷口上重重捅了一刀。

歷史就是生活的寫作版，一串串的偶然連接著，必然似乎順勢就掉下來了。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真信成權的資料

二

順勢掉下來的可能是必然，也可能是刺猬或者狐狸。要讓自己希望的果實掉下來，需要精心的澆灌、培養和維護，不是只坐在樹下乾等就可以的。

抗戰時期，是中國共產黨的迅速上升期。中共是一個具有強烈理念型傾向的政黨，這樣的政黨通常有強烈的原則立場，自我期許高、進取心強、效率優先，呈現剛性政黨的特質。抗戰時期，這一點毫未變化。同時，戰爭中的生存要求，以及戰時統一戰線給這個黨注入的柔性成分，使之靈活性和策略性一面可以不受既有理論的限制得以展現。權力運作呈現彈性，政權機器中貫注溫情，無論政治、軍事還是社會政策，都以取法其上、得乎其中為目標。中共之所以為中共，抗戰是一個特別重要的階段，正是在此時期，中共初步完成其歷史與現實中的自我定位和確認。踏踏實實，不務虛名，堅持持久戰方針，不斷堅強自己的隊伍，強化根據地，造就了一種韌性的生存。

韌性的生存不是那麼耀眼，卻是理解那個時代、理解中共敵後戰場的鑰匙。以游擊戰、根據地為主要戰爭形式的敵後戰場，最重要的關鍵詞就是生存，無論山地還是平原，中共都堅持持久戰的目標，以游擊戰、根據地、正規軍為基礎，通過黨政軍民的總體戰，利用日軍兵力不足及異民族作戰的弱點，打破其完全佔領的夢想，使之始終處於敵後根據地的抵抗和威脅之下，而中共則在戰略和政略結合指導下的持久堅持中，不斷壯大發展。

生存的要求看似不那麼積極，實際則是當時中共乃至整個中國抵禦侵略的現實道路。中共抗戰中的成長是一個系統工程，持久是系統工程，抵抗也是系統工程，生存更是系統工程。游擊戰是為了生存，根據地也是為了生存；大而言之，整個的抵抗就是為了生存。中共要用我之生存，壓縮對手之生存，生存需要通過抵抗獲得，生存本身就在抵抗，生存和抵抗聯為一體，此即所謂生存中的抵抗、抵抗中的生存。應該強調的是，中共的生存是在全國抗戰的背景下實現的，某種程度上，還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在世界反侵略戰爭的大背景下展開的，因此，這樣的生存本身是正面和敵後聯合抵抗的一部分。中共的敵後生存以陝甘寧邊區為後方，陝甘寧又以全國的大後方為後方，正面戰場的堅持抵抗和牽制，是敵後生存得以成立的重要條件，敵後的生存又有力支持了正面的持久。

敵後的生存是達成持久的重要一環，要堅持敵後生存，強固自身必不可少。中共承接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理論、組織和信仰，造就了一個黨性鮮明、執行力和組織力強大的政黨。馬克思主義是一門強調實踐的理論，精準的社會肌理解剖使之在政治社會運動中如魚得水。儘管中共初期的理論水準不高，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精神還是通過各種方式深入黨心，由此逐漸形成中共的政治文化。[1]

中共政治文化生發的力量很難以量化方式展現，卻在中共崛起與發展進程中不可忽略。中共幹部普遍具有實踐、聯繫、辯證的觀點，不僅使之掌握瞭解世界的認識論，也獲得處理紛繁複雜問題的行動利器。1942年6月，太行一分區負責人秦基偉等向上級遞交如何開展敵後游擊戰爭的經驗報告，總結多條經驗，包括靈活的鬥爭方式、適度的武裝鬥爭火候、善於迷惑敵人、組織合法與非法鬥爭之配合、軍政結合等，[2]這

香港浸會大學出版社·僅供版權審閱資料

1 政治文化最初是西方學者在比較政治學視野下提出的概念，旨在從二次世界大戰後各國現代化的不同命運中，探討是什麼推進和阻礙著現代制度的推進及其有效性。基於此，最初這個概念特別重視歷史及心理兩個維度。隨著這一概念被廣泛使用，概念內涵已有變化，有學者說：「一般認為，政治文化包括政治認識性成份、政治情感性成份、政治價值性成份和政治理想性成份，由它們聚成一個整體。」（王滬寧：〈轉變中的中國政治文化結構〉，《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3期）目前，國內學界較多將政治文化理解為：「受國家歷史傳統和現實社會政治生活影響形成的，對人們的政治行為產生持久影響的包括政治態度、政治情感、政治認知政治動機等因素在內的政治心理和政治價值觀、政治思想的總稱。」（倪明勝、喬貴平：《新政治學之維》，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99頁）

2 〈一年來對敵鬥爭的三個具體經驗的初步整理〉，《郭峰工作文集》，遼寧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8頁。該文由郭峰執筆，署名秦基偉、高揚、胡震、郭峰。

其中既包括具體的接敵技術，又有各種技術的相互配合，還有對敵鬥爭的策略分析。這種將一時一事放在更廣大的背景及知識系統中予以解剖的思路，在中共黨內可謂常態，將之與同時期國軍將領的經驗總結對照看，尤其令人印象深刻。黃埔一期生、國軍名將夏楚中於1941年發表文章總結了六點抗戰經驗，即「加強近接戰鬥的訓練」、「注重射擊運用」、「演習據點攻擊」、「確立據點戰術信心」、「側重重點教育」、「加強精神教育」。[3] 與秦基偉相比，夏楚中基本只是講了接敵技術，而沒有像秦基偉那樣把問題拉到鬥爭方式、鬥爭火候、敵我形勢、軍政結合的高度。儘管兩個文本面對的問題不盡相同，但國共兩軍將領思考方式的差異，確有顯現。正因此，抗戰時期，中共展開新兵教育時強調：「新戰士中，有一部由於參加過友軍或受保衛團等集體訓練的，使他們受過呆板的教育，他們要改變成為靈活運用和在我們規定的動作上統一起來。」[4] 內部總結中出現的國共兩軍呆板和靈活判斷，既體現中共對靈活性的特別在意，也是當時真實狀態的顯現。

中共政治文化的形成，當然非一朝一夕所致，需綿綿用力，久久為功。中共是一個高度強調信仰、理念的政黨。世界上大概很少有哪個政黨像共產黨這樣重視理論，學習理論。中共黨人留下的日記中，可以看到大量理論學習的記載，而這在同時期國民黨人留下的日記中幾乎難覓蹤影。同樣是中高層幹部，國民黨人陳克文抗戰時期的日記觸目可見喝酒、宴請、牢騷以及周圍人各種各樣的花邊新聞，共產黨人王恩茂、陳伯鈞等的日記則不斷出現學習、讀書、討論、培訓的記載。這樣的比較絕不僅僅是個案，幾乎是兩黨幹部各自呈現的共性。中共黨人受到的持久的灌輸、不斷的檢查、考核、批評與自我批評乃至思想鬥爭，儘管不可能使之完全脫離普遍的人性，但由此形成的政治文化仍在一點一

3 夏楚中：〈部隊訓練之血的教訓——我的作戰經驗〉，重慶《黃埔》第6卷第5–6期，1941年4月13日。

4 〈1938年第120師抗戰一年來軍事報告〉，楊弘、盧雲山編：《周士第將軍陣中日記》，石家莊機械化步兵學院2005年版，第348頁。

滴、潛移默化地塑造著一個不一樣的黨和軍隊。新聞人趙超構抗戰後期去延安後發現，中共生產了一套自己的價值觀，與外界幾乎處於兩個邏輯系統中：

> 凡是依我們標準認為缺點的地方，在他們自己看來都是優點。我們認為這種教育限制了個性，他們倒覺得唯有如此，才能為群眾服務。我們認為它太功利化，他們卻以為這是「學用一致」。我們認為理論水準太低，他們的答覆則是「實事求是」。
>
> ……
>
> 這種標準化的精神生活，依我們想像，是乏味的。但在另一方面，也給予他們的工作人員以精神上之安定，而發生了意志集中行動統一的力量。[5]

姑且不論趙超構談到的這些問題的是是非非，價值觀重新塑造凝聚的向心力卻是不言而喻的，這樣的黨和軍隊不一定像曾經宣傳的那樣全知全能，卻足以擁有超乎其他政治力量的威力。1939年，聶榮臻談到八路軍為什麼能在敵後堅持游擊戰時，不無自豪地說道：「所謂由整化零等游擊戰術實並不易(由零可化為無)，如甚易，則八路已不值錢了。敵人把我游擊戰術作研究而謀殲滅我之對策，但是機械的。游擊戰術實不易把握。」[6] 這是深得中共武裝精髓的經驗之談。

1945年7月，由美國戰爭信息局撰寫的長篇報告《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起始部分就明確指出：「幾乎所有不帶偏見的觀察者都一致強調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最卓有成效、有最好的政治組織系統與最強的紀律性、最有建設性的隊伍。」[7] 這樣的話，雖然出自美國人之口，卻不失為當年

---

5 趙超構：《延安一月》，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3年版，第145、75頁。

6 聶榮臻：〈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黨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39年1月)，《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第1冊．文獻選編(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27頁。

7 Lyman P. Van Slyke,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A 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War Departmen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8.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享有版權的資料

中共陣營的真實寫照。要達到報告中所說的政治品質，紀律固然重要，保證紀律得以落實與貫徹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文化同樣重要，這樣一個如報告中所說的運作系統，缺了任何一環，效力都可能大打折扣。後世的人們常常會在意自己的自由意志能不能得到伸張，卻先定地認為歷史中的人是只求溫飽的動物，從而忽略當年美國人已經看到的事實。作為觀察者，美國人沒有因為意識形態不同而刻意扭曲他們的觀感，因為他們深知，只有切實瞭解這支政治力量，才有可能拿出有效的應對辦法。這是現實主義的態度。不管出於什麼目的，這種面對事實的態度都值得肯定，低估對方是人類普遍而又愚蠢的行為。

香港作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三

美國人的報告顯示，當年他們已經注意到中共政治、組織運作的系統性。系統性的確是中共思想和行為十分重要的特徵。

系統一詞意為「由部分組成的整體」。一般系統論的創始人貝塔朗菲認為：「一般系統論是關於『整體』的一般科學，在此之前整體被人們看作是一個不明確的、模糊的和半形而上學的概念。」[8] 系統源於人們整體認知世界的要求，是個古老的概念，二十世紀前後，被越來越普遍地使用，現代系統理論一般被認為「萌發於20世紀初，形成於20世紀30–40年代，發展於20世紀50–60年代」。[9] 通常說的系統，是指由一些相互聯繫、相互制約的若干組成部分結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機整體。一個系統至少要由兩個或更多的要素或子系統組成。系統的整體不是各組成要素功能的簡單疊加或拼湊，而是有機地組成一個整體，

8 馮．貝塔朗菲著，林康義、魏宏森譯：《一般系統論——基礎、發展和應用》，清華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頁。

9 轉見吳今培、李學偉：《系統科學發展概論》，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頁。

組成要素及其聯繫必須服從系統的整體目標，要以整體最優為原則。系統具有強烈的目的性，系統整體的功能通常超出各個部分的疊加，所謂「整體大於部分之和」。中共革命中常常可以看到的溢出效應，就來源於系統的這一特徵。

系統追求整體的把握和瞭解，但系統並不是封閉自足的概念，貝塔朗菲強調開放系統：「每一個生命有機體本質上是一個開放系統。它在連續不斷的流入與流出之中，在其組分的不斷的構成與破壞之中維持自己，只要它是有生命的，它就永遠不會處於化學的和熱力學的平衡狀態，而是維持在與平衡狀態不同的所謂穩態上。這是通常所說的新陳代謝這個基本生命現象的真正本質。」[10] 德內拉．梅多斯則認為，系統運作呈現三個重要的特徵：適應力、自組織和層次性。所謂適應力，是指系統內部存在很多相互影響的反饋回路，這些反饋回路傳達信息，做出反饋，使系統迅速調整，保持穩態結構。所謂層次性，是指任何一個大的系統都包含很多子系統，系統和子系統間形成包含和生成關係。一個良好運轉的系統，層次結構可以平衡整體系統和子系統的福利、自由和責任。所謂自組織，是指系統不是靜態的，系統具有學習、運動、多元化、複雜化和進化的能力，在沒有特定外部作用參與時，系統通過信息反饋，可以不斷調整自己的目標和功能，甚至演變出新的結構，發展出全新的行為模式。[11] 由此可以看出，現代意義上的系統，既具有很強的規定性，構成行為和思維模式；又具備足夠的彈性，在辯證地生成、進化。所以貝塔朗菲明確表示：「雖然起源不同，但一般系統論的原理和辯證唯物主義相類似則是顯而易見的。」[12] 也就是說，在貝塔朗菲看來，一般系統論具有強烈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特性。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僅供版權擁有者閱讀

---

10 馮．貝塔朗菲著，林康義、魏宏森譯：《一般系統論——基礎、發展和應用》，第36頁。

11 參見德內拉．梅多斯著，丘昭良譯：《系統之美——決策者的系統思考》，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4–118頁。

12 龐元正、李建華編：《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經典文獻選編》，求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8頁。

中國傳統思維也有明顯的系統特徵。李澤厚指出：「正如古代有辯證法的觀念一樣。它們都來自素樸的生活經驗。在中國特定條件下，系統論觀念如同辯證法觀念一樣，它們發展得特別充分。」[13] 不過，李澤厚同時強調，這種系統論由於早熟，也有很多缺陷：「在這種系統論裏，似乎把所有經驗都安排妥貼了，似乎一切問題都可以在這系統中求得解決，從而不要求思維離開當下經驗去作超越的反思或思辨的抽象以更深地探求事物的本質。……同時，也是由於注重系統整體，便自覺不自覺地相對輕視、忽略對眾多事物和經驗作各別的單獨的深入觀察和考查，具體事物的分析、剖解、實驗被忽視了。」[14] 相對於傳統未經分疏、混沌、包羅萬象的系統認知，經過現代科學洗禮的系統既是整體的，又是有限的、競爭的、[15] 開放的，如貝塔朗菲所說：「現代科學的思想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沒有一個唯一的包羅萬象的『世界系統』。一切科學構思都只反映了實在的某些方面或某些透視圖。……各種各樣的『系統理論』同樣也是反映了不同側面的模型。它們不是互斥的，常常可以組合起來應用。」[16]

本書也是在上述規定性和彈性兼備的意義上使用「系統」這一概念，並從規訓系統、貫徹系統、抵抗系統三方面，觀察中共革命系統的具體運作，這三者自成系統，其實又相互影響。規訓系統培養幹部，有助於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13 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4頁。

14 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第172頁。

15 關於系統內部的競爭關係，貝塔朗菲認為：「對於一個整體來說，引入組成部分之間競爭的概念，似乎是自相矛盾的。然而，事實上這兩個明顯矛盾的陳述都是系統的本質。任何整體都是以它的要素之間的競爭為基礎的，而且以『部分之間的鬥爭』(羅克斯Roux) 為先決條件。部分之間的競爭，是簡單的物理—化學系統以及生命有機體和社會體中的一般組織原理，歸根到底，是實在所呈現的對立物的一致這個命題的一種表達方式。」馮·貝塔朗菲著，林康義、魏宏森譯：《一般系統論——基礎、發展和應用》，第61頁。

16 馮·貝塔朗菲著，林康義、魏宏森譯：《一般系統論——基礎、發展和應用》，第87–88頁。

貫徹系統的運行，幹部系統和貫徹系統的有效推進，是抵抗系統得以成立的基礎，而抵抗系統的運作，又要求幹部系統和貫徹系統的提升。共產主義革命的整體性特徵，加上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很容易把中國革命引向全方位的、系統的革命，系統的革命又造就著強大的革命系統，兩者迴環運動，相互促進。特別需要說明的是，強調中共革命具有系統性運作的特徵，做的只是實然判斷，也就是說，這是作者觀察到的一種特徵，至於一個政治力量乃至一個社會是不是應該如此，那是應然判斷。的確，系統的高度條理化、模式化，很容易放大對錯，形成不可逆的慣性，有其值得警惕的一面，不過，如果把系統視為一個動態運作的彈性概念，那麼對系統過分條理化、規範化、固化的擔心，或許可以減少很多。進一步看，中共的革命系統有很多面相，橫看成嶺側成峰，從結構言，意識形態(辯證法)和組織可以說是中共革命系統的核心要素，兩者分別構成中共系統思維和系統運作的基礎，組織將無聯繫的人和事建立特定聯繫，其實就是系統運作的過程；從功能言，中共的革命系統又可以分成權力系統、貫徹系統、動員系統、培養系統等等，這些系統間又是相互影響、相互聯繫的，並沒有截然分野。事實上，中共革命既在系統之中運作，又在不斷造就、生成系統。系統運作本身，就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抗戰時期，對中共革命理論產生決定性影響的毛澤東，在系統思維和系統運作問題上多有闡發。[17] 早在1926年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毛澤東使用過「系統」一詞：「中國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種有系統的權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國一省一縣以至一鄉的國家系統(政權)，(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長的家族系統(族權)，(三)由閻羅天子城隍廟王以

17 關於毛澤東的系統思維，1980年代，系統論興盛時，國內學界已有注意，較早的論文包括：陳軍〈略論毛澤東同志的系統觀〉，《學術論壇》1983年第5期；范幼元〈毛澤東的系統觀〉，《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1985年第7期等。近年還有羅緒春等的〈毛澤東系統論思想初探〉(一)、(二)，《系統科學學報》2015年第2期、2016年第2期。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僅有版權的資料

至土地的陰間系統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種神怪的神仙系統——總稱之為鬼神系統(神權)。」[18] 這裏，毛澤東是在同類事物組成的整體這一最基礎的意義上使用「系統」這一概念。

1938年，毛澤東寫作〈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已經開始在方法論意義上使用「系統」:「我們要系統來講辯證法，就要講講唯物辯證法的許多問題。」毛澤東進一步強調：「實際上具有唯物的與辯證的頭腦之革命者，他們雖從實際中學得了許多辯證法，但是沒有系統化，沒有同已經成就的唯物辯證法那樣的完備性與深刻性，因此必不能洞察運動的遠大前途，不能分析複雜的發展過程，不能抓重要的政治關節，不能處理各方面的革命工作，因此仍有學習辯證法的必要。」[19] 在毛澤東看來，是不是系統化地理解辯證法，掌握馬克思主義系統思考的方法論，關涉革命者能否洞察政治發展趨勢、掌握革命運動的方向。正因此，毛澤東說：「如果中國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主義的同志，那將是等於打倒一百個日本帝國主義。」[20]

不過，對當時中共的現實狀況，毛澤東判斷並不樂觀，他認為，中共的「政治工作的研究有第一等的成績，經驗之豐富，新創設之多而且好，全世界除了蘇聯就要算我們了，其中若干特殊的經驗連蘇聯也沒有，但缺點也在於綜合性與系統性之不足」。[21] 或許正是要解決系統性不足的問題，延安整風期間，毛澤東非常重視系統性的訓練，指出：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18 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續)，湖南戰士編輯社：《戰士》第39期，1927年4月3日。

19 毛澤東：〈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竹內實監修：《毛澤東集》第6卷，第299–302頁。鑒於考察概念流變時文本所具有的特殊意義，本書在這一部分使用蒼蒼社出版的《毛澤東集》，其他地方均使用《毛澤東選集》。

20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竹內實監修：《毛澤東集》第6卷，第260頁。

21 毛澤東：〈戰爭和戰略問題〉，《黨的政策選集》，晉察冀日報社1946年版，第60頁。

「像我黨這樣一個大政黨，雖則對於國內國際現狀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績，但對於國內國際的各方面。對於國內國際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們所收集的材料還是零碎的，我們的研究工作還是沒有系統的。二十年來，一般地說，我們並沒有對於上述各方面作過收集材料與著重研究的系統的周密的工作，缺乏調查研究客觀實際狀況的濃厚空氣。」[22] 他將不系統做調查研究的做法稱為主觀主義：「對於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具體情況，不願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研究，僅僅根據一知半解，根據『想當然』，就在那裏發號施令，這種主觀主義的作風，不是還在許多同志中間存在著嗎？」[23] 基於此，「向全黨提出系統地周密地研究周圍環境的任務」。[24]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對於主觀主義的批評，對於缺乏調查研究的批評，都受到了當時乃至後世的充分重視，但他在調查研究前面加的「系統的」定語卻往往被忽略，事實上，這一整風期間反復出現的定語，在毛澤東的思想體系中並非可有可無。

在〈反對黨八股〉中，毛澤東進一步倡導要改變文風。文字關係信息傳輸，改變文風，實際就是要改變系統中的信息反饋狀態，提高信息反饋的有效性。所以他說：

> 單單按照事物的外部標幟，使用一大堆互相沒有內部聯繫的概念，排列成一篇文章、或一個演說，或一個報告，這種辦法，他自己是在做概念的遊戲，也會引導人家都做這類遊戲，使人不用腦筋想問題，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質，而滿足於甲乙丙丁的現象羅列。……要解決問題，還須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工作與研究工作，這就是分析的過程。提出問題也要用分析，不然，對著模糊雜亂的一大堆事物的現象，你就不能知道問題即矛盾的所在。這裏所講的分析過程，是指系統的周密的分析過程。常常問題是提出

22 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竹內實監修：《毛澤東集》第7卷，第311–312頁。

23 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竹內實監修：《毛澤東集》第7卷，第314頁。

24 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竹內實監修：《毛澤東集》第7卷，第319頁。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僅供版權約定學術用

> 了，但還不能解決，就是因為還沒有暴露事物的內部聯繫，就是因為還沒有經過這種系統的周密的分析過程，因而問題的面貌還不明晰，還不能做綜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決問題。[25]

這裏反復出現「系統」兩字，當非偶然，顯示毛澤東以系統思維取代片面、直線式思維的雄心。從毛澤東的要求可以看得出來，他講的系統，是辯證的、開放的、分疏的、競爭的，和現代一般系統論講的系統具有相通性。事實上，如〈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所顯示的，毛澤東的系統觀，直接源於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這是他提出系統方法的起點；同時，中國傳統樸素的系統論，相信也有潛移默化的影響，起碼讓他對系統論的思維方法不會陌生。抗戰時期毛澤東關於系統思維、系統方法的闡述和呼籲，奠定了中共系統認知的基礎，促進著思想和工作方法的提升。抗戰行將結束時，毛澤東在中共七大做口頭報告，談笑風生中，再一次將革命、理論、馬克思主義和系統放在一起予以概括：「革命要求我們能說明中國的革命運動，說明這個運動的各個方面，說明它的內部聯繫，包括軍事、政治、文化、經濟，整個革命工作的各個側面及其內部聯繫，並總結經驗，把它提高起來，使之條理化、系統化。什麼是理論？就是有系統的知識。馬列主義的理論，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的有系統的知識。」[26]在毛澤東這裏，系統成為有效聯結革命實踐和革命理論的鏈條。

捕捉這樣的鏈條，可能是當年的歷史創造者和事後的歷史研究者的共謀。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未有版權的資料

---

25 毛澤東：〈反對黨八股〉，竹內實監修：《毛澤東集》第8卷，第100頁。

26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口頭政治報告〉（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147頁。

四

蘇聯的奧斯特洛夫斯基寫過一本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描寫一個鋼鐵般的共產黨人是如何成長起來的。

本書面對的是一個鋼鐵般的政治力量的成長史。抗戰時期，一股巨大的洪流，像鐵水般，流出西北，流向華北，進而流向全中國。[27]

鐵水流，是的，鐵水流！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27 本書主要面對的是抗戰時期八路軍佔領區域的中共，考察對象包括華北和西北地區的敵後根據地。需要說明的是，如拙作《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不是一個區域史研究一樣，本書也不是。選擇八路軍區域純粹出於考察的完整和方便，並無其他。